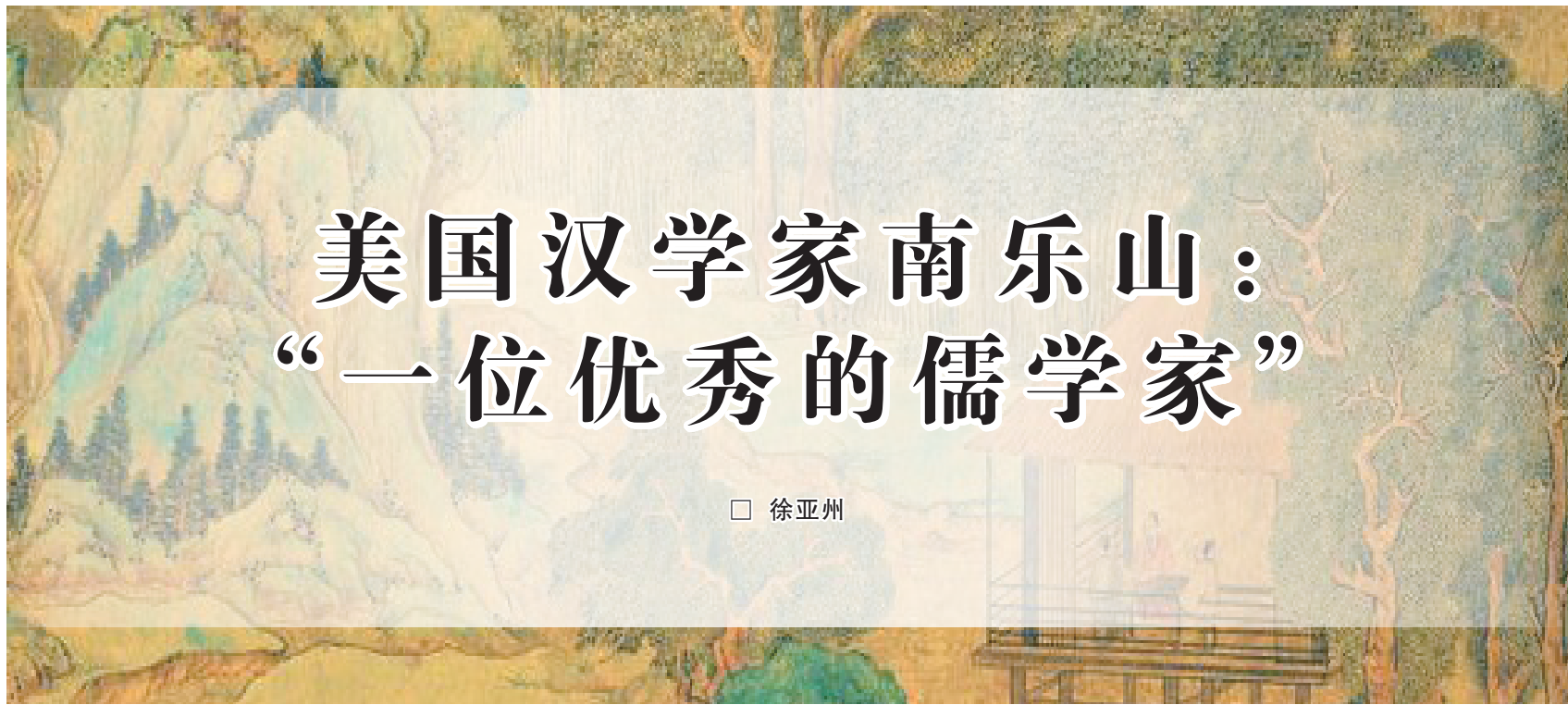


南乐山（Robert Cummings Neville）是美国波士顿大学哲学、神学和宗教学教授，1963年获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波士顿大学神学院荣休院长，曾任美国形而上学学会主席、国际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以及波士顿神学院联合会理事会主席等职。南乐山学术研究领域较为广泛，涵盖哲学、神学、宗教、伦理等多个领域和交叉学科，特别是在中西思想的文明互鉴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中国学者杜维明称他为“一位优秀的儒学家”，柏拉图思想研究者斯坦利·罗森称他为“一位优秀的柏拉图哲学家”。南乐山的代表作有《波士顿儒学：晚期现代世界可移植的传统》《在上帝面具的背后——儒道与基督教》《礼仪与尊重：在比较语境中延伸中国哲学》等等。

“波士顿儒家学派”

南乐山与杜维明、白诗朗在儒家思想的研究方面有着长期的探索，共同开创了“波士顿儒家学派”，致力于儒家思想的当代研究和传播。

“波士顿儒家”一词最早由南乐山教授提出，并在1991年的“儒家与基督教对话会议”中首次公开使用，此后，在1994年美国人文与科学院杂志《代达罗斯》的会议中再次使用。仅仅从字面意思上来看，“波士顿”与“儒家”似乎是两个毫不相干的词汇。然而，从跨文化与文明互鉴的角度来看，二者的联结则有着极其重要的开创意义和学术意蕴。南乐山认为，作为一种哲学传统的儒家思想可以很好地将其从东亚文化中移植并推广到西方现代文化中去。南乐山的代表作《波士顿儒学：晚期现代世界可移植的传统》出版，标志着“波士顿儒家学派”的正式确立。此后，杜维明和白诗朗以“波士顿儒家”为题，举办了一系列的学术会议并发表了诸多相关成果，“波士顿儒家学派”立足于以文



□ 徐亚州

美国汉学家南乐山： “一位优秀的儒学家”

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在儒家思想的研究与推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客观上推动了儒家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国际儒学界的影响范围与强度也越来越大。

成为“全球化的哲学”

“波士顿儒家学派”不仅是儒家思想在当代语境下的创新运用，同时对于世界文明的交流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推动意义。南乐山认为，不仅要注重儒家思想在东亚文化中的意蕴阐发，更应推动儒家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持久发展。不能简单地将儒家思想作为一种普通的文化现象甚至作为一种过时的思想文化对待，而是应该着重发掘儒家思想中的实践智慧与世界意义。在第八届中国哲学年会上，南乐山明确指出了儒家思想的世界性意义，强调儒学应该成为一种“全球化

的哲学”，表达了对于儒家思想未来发展的高度期待。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不仅可以发展成为审视当代文化合理与否的重要参照，而且可以通过现代性转换较好地服务于世界发展与人类文明。在“仁义礼智信”的人伦大道中，儒家尤为关切现实世界的道德理性和修身养性，这对当代世界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引意义。

相对于西方大多数哲学思想来说，儒家思想在理论思考和现实指引的结合方面有着独特的建树，这也是最初吸引南乐山深入研究儒家思想的原因所在。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注重挖掘儒家思想超越民族、种族、国界和信仰的价值与意义。在比较经学与中国宗教对话系列访谈中，南乐山认为儒家思想与一般意义上的宗教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对于超自然力量并没有核心关切，反而更多地蕴含着科学精神和哲学智慧。从儒家思

想的终极关怀来看，虽然带有天道、阴阳、理气等形上词汇，但更多以血亲人伦和现世事功为出发点与归宿。正如儒家的八条目所阐述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而外王的思维，规避了西方哲学偏执于理性、思辨的理论局限。按照儒家思想的逻辑，本体论、道德论和政治论可以形成一个完美的有机整体。

“河北派”与“河南派”

随着“波士顿儒家学派”的推进发展，内部以查尔斯河为界又分为南北两派，“河北派”以杜维明为代表，“河南派”以南乐山、白诗朗为代表。

河北派侧重于对孟子思想的挖掘，强调个体在内心省察方面的功夫。在世界文明的对话中，杜维明认为儒家人文思想可以充分发挥媒介作

用，切实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原则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道原则。按照杜维明的理解，发挥儒家思想的媒介作用并不意味着世界文化要“独尊儒术”，而是让儒家思想真正参与到人类文明的对话中，进而最大限度超越狭隘的“西方中心论”与“文明优越论”。

与河北派不同，以南乐山、白诗朗为代表的河南派则侧重于荀子思想的挖掘，强调发挥礼仪文化的外在规制作用。实际上，在河南派思想的深层意涵和内在逻辑中，南乐山、白诗朗看到了荀学中礼法思想的重要意义。

南乐山认为，儒家关于礼仪文化的强调不仅与保守主义无关，而且是一种革命性哲学。儒家文化在应对社会转型的问题中具有当代价值。从儒家文化产生的时代背景来看，大转型、大动荡的春秋时代，社会制度与

生产方式皆处于转型之中，这使儒家文化天然带有革命性力量，进而才能较好地应对与解答时代的转型问题，在百家争鸣中占有重要地位。原始儒家传承与挖掘礼仪文化中的合理成分，正是一种应对时代变革的特殊方式。南乐山认为，原始儒家的礼仪文化对于现代社会的伦理实践依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南乐山认为，儒学和佛教、基督教有一个共同点：即主张“每一个人都应该受到尊重”。“爱有差等”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去尊重、不去爱戴那些所谓的“疏远”之人。同样，对于“裙带关系”的指责也并不是因为我们关爱了“亲密”之人有什么错，而是由于我们没有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基于此种内在逻辑，原始儒家不仅不是“保守文化”，而且是一种典型的“超前文化”。因而，南乐山甚至将儒家文化理解成一种“背道而驰”的革命乌托邦主义。

然而，无论河南派还是河北派，都发现了儒家思想中丰厚的哲学智慧与实践意义，对于深入推进儒家思想的传承发展，以及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波士顿儒家学派”的研究与探索当中，儒学不仅没有落后保守的元素，反而带有一种超前的革命性。一方面，传统儒学作为世界文明的重要一脉，应该充分挖掘其宝贵的内蕴与资源。另一方面，传统儒学作为一种文化生命与存在方式，依然可以成为现代性的力量源泉。应当思索的问题不应是儒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能否契合于当代世界文明，而是如何真正激活儒学在世界文明中的巨大生命力，让它焕发应有的夺目光彩。正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海外汉学家



大熊猫： 传说中的『食铁兽』与『蚩尤坐骑』

全球史中的生物与人

大熊猫是中国特有的珍稀保护动物，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上千万年，有生物界活化石的美誉，是中国的“国宝”。它有着圆滚滚的身材，看上去总是步伐迟缓，一副憨态可掬、与人为善的样子，殊不知其实在古代人心中，大熊猫却是与虎豹齐名的猛兽，认为它专爱吞食铜铁，又叫它“食铁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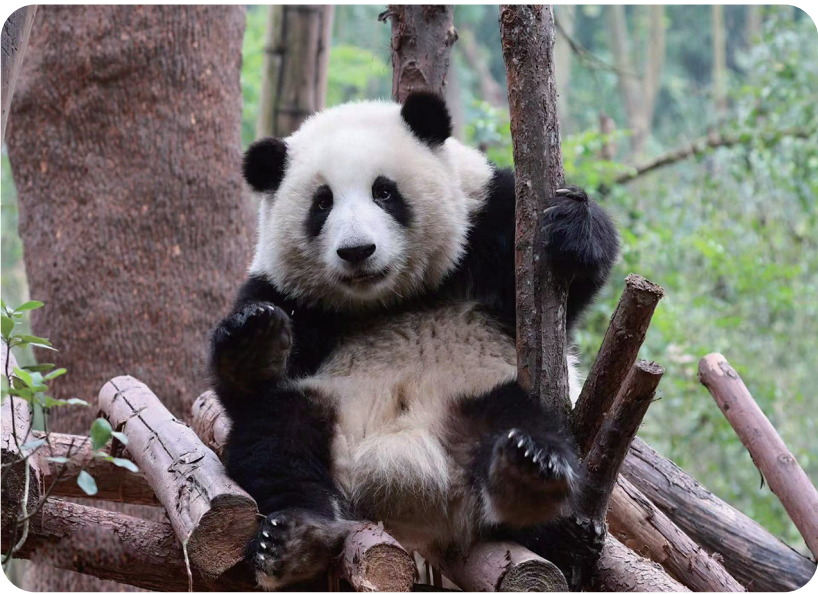
古人眼里的“食铁兽”

近代大熊猫自被发现以来，中文名就有猫熊、熊猫、大猫熊、大熊猫等多种叫法，而早在中国先秦时期大熊猫称谓就更多了，像貔、貔、白黑、貔貅、食铁兽等。根据大熊猫的特征又衍生出各种叫法，比如人们认为大熊猫有很强的战斗力，就有了“猛豹”或“猛氏兽”之称；按照毛色又取名“玄貔”“白豹”“黑豹”“白狐”“银狗”“白熊”“白虎”“花熊”“文黑”“黑白熊”“竹熊”等。

熊猫专家胡锦矗认为，中国早期记载大熊猫的文献是《尚书》和《诗经》。《尚书·牧誓》提到了“如虎如貔”，《诗经·大雅》里也出现了“猷其貔皮”的记录。后来三国时期的吴陆玕在他的著作《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解释了“貔”，说“貔”既像虎又像熊，大概率是现在的大熊猫。

总的来说，“貔”是比较被人们所认可的古人对大熊猫的一种称呼。“貔”在许多典籍中出现，《尔雅》描述“貔”是一种白豹，晋代郭璞注解它“似熊，小头庠脚，黑白驳，能舐食铜铁及竹骨”。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在《王力古汉语字典》里认为“貔”似为“大熊猫”。

世人在谈及“貔”时，大都会说到它食铁的特性。唐代段成式在《酉阳杂俎》里说它是“天铁熊”，校注又称“舔铁熊”。《后汉书》里提到了“貔兽”，对此李贤注解称，《南中八郡志》里认为它像熊，力气很大，能食铁。左思在《蜀都赋》中说“貔”就是“食铁之兽”，刘逵对此注解



道：“毛黑白，臆似熊而小，以舌舐铁，须臾便数十斤，出建宁郡也。”建宁郡就是今天的云南东北部、四川南部一带。

宋人罗愿又延伸了以上说法，他在《尔雅翼》里描述得最是绘声绘色，“貔，今出建宁郡。毛黑白，臆似熊而小，能食蛇；以舌舐铁，可顿进数十斤。溺能消铁为水。有误食针铁在腹者，服其溺则化……今蜀人云，峨眉山多有之”。说“貔”这种似大熊猫的动物，能够用舌头舔舐铁具，而且一次能吃数十斤，它的溺液能够融铁，因此也不用担心消化问题，实在过于神化了。

到了明末，人们不仅延续了过去的说法，还举了不少生动的例子。姚可成在《食物本草》中说“貔”，在“今黔、蜀及峨眉山中时有之。土人鼎釜多为所食，颇为山居之患。其齿极坚，以刀斧推，锻铁皆碎落，火亦不能烧”。认为大熊猫在今天川贵地区时而出，它们的牙齿十分坚硬和锋利，看见铁制炊具就会啃噬吃掉，人们常不堪其扰。清代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里也说四川川东一带有貔兽，人们上山打柴时为了方便，把食物盛在铁甑中，而“貔”常乘人们不注意时啃食铁甑。

在当代，不少学者认为大熊猫是“食铁兽”这件事儿，纯属古人对大熊猫的附会和想象。因为古人很少能见到大熊猫，偶然看见大熊猫觅食时舔咬铜铁，便有了“食铁兽”的印

象，但其实它们或为好奇顽皮，或为补给盐分才有了舐铁行为，却不至于像古籍中说的把铁当成一种美味食物，专食铜铁。

然而也有学者不这么看，因为他们找到了一些大熊猫确实食铁的证据。1981年《南方日报》就有一篇文章说，近期在四川卧龙保护区有一只大熊猫，有一天吃饭时，竟把铁饭盒咬碎后一块吞进了肚子里，而后随着粪便排出，居然没有损伤肠胃。文中还发出这样的感慨，“古人称为食铁兽，并非虚构”。

永不褪却的“熊猫热”

大熊猫的发现史可以追溯到几百万年前的中新世晚期，通过对目前已知的大熊猫化石进行研究，我们发现辽阔的中华大地上一直都有大熊猫分布。民间传说，蚩尤在涿鹿之战中的坐骑就是熊。但大熊猫的科学发现至今不过150年，“大熊猫”这个名字的出现也不过百年。

在四川有一处叫宝兴的地方，旧名叫穆坪，位于距成都230公里的夹金山下，这里的环境优美，生长着大熊猫最爱吃的箭竹。在19世纪，有一名叫戴维的法国人带着探索的意图来到了宝兴。戴维是动物学家和植物学

家，一生中曾经三次来中国探险。1869年，戴维来到邓池沟，他斥委托当地猎人搜集动植物标本。戴维在日记里记录了1869年3月11日这一天，他首次在一个猎户家中见到了大熊猫皮，当时戴维大为震惊，预感这可能是科学上一个有趣的新物种。4月1日，在数名猎人的帮助下，戴维获得了一只可爱的活体大熊猫，但正当他准备启程回法国时，这只大熊猫却不幸病逝，戴维只好将其毛皮制成标本，送往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戴维没有想到标本刚送到就引起轰动，并掀起了一股持续百年的“熊猫热”。

把大熊猫热推向世界舞台的是《中国杂志》。1923年，英国博物学家苏柯仁在上海创办了《中国杂志》，他联系上澳大利亚传教士叶长青，之后叶长青在上面发表了多篇关于大熊猫的报道。

1930年，苏柯仁亲自撰写了一篇关于美国罗斯福考察队在四川西康地区寻找大熊猫过程的文章，由于探险队的领头人罗斯福兄弟正是当时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儿子，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就引起了世界性的轰动。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媒体界掀起一股“熊猫热”，人们都争相报道、抢发关于大熊猫的新闻。

1936年的冬天，美国服装设计师露丝从宝兴带回了一只还没睁眼的活体大熊猫幼崽，取名叫“苏琳”。1937年春，“苏琳”在芝加哥的布鲁克莫尔德动物园被展出，因好奇前来探望的观众有四万人之多。

一个旅居英国的作家蒋彝，给一只叫“明”的大熊猫创作了两本书，一本叫《明的故事》，一本叫《金宝和花熊》，讲述大熊猫“明”到达伦敦的旅程。他在书里充分发现了大熊猫的外交才华，说“明”是中国的真正代表，跟中国人一样善良又热情好

客。中国的大熊猫也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舞台，为中外友好和平作出了贡献。

中国的外交名片

“貔貅”是中国神话里经常出现的动物，但很多人不知道“貔貅”也是大熊猫的古称。“貔貅”最早出现于《史记》中，司马迁写道：“教熊黑貔貅貔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清稗类钞》里说“貔貅”是似虎又似熊、毛色灰白被称为白熊的动物，是大熊猫无疑。貔貅虽然威猛，却有招财的功能，是一种瑞兽、仁兽。《洪雅县志》中一名拔贡，认为貔貅不伤人，性慈近佛，能吃虎豹，是以仁勸暴的典范。

胡锦矗认为，“貔貅”“骆虞”“貔”都是大熊猫的古名。“骆虞”就是仁兽的代表。《毛诗故训传》记载“骆虞，义兽也，白虎黑纹，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则应之”，表明骆虞是一种体色黑白、不主动捕食其他动物的仁义之兽。《资治通鉴》也记载了“骆虞仁兽，故以解兵”，古人遵从礼仪，拥护仁君，推崇仁义之师，可以说“骆虞”这种动物是中华文化仁义的象征。

据此文化内涵，武则天曾将两只大熊猫作为国礼赠送给日本天武天皇，以示友好往来，开启了中国最早的“熊猫外交”。

英国伦敦动物协会会长莫里斯曾列举了大熊猫的20个优点，比如活泼、爱玩、对人友好、珍贵稀有等，鉴于这些特征，一些重大的国际活动也经常选用大熊猫作为吉祥物。